

## 历史上的大流行病与公共崇拜

新冠病毒给全世界教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隔离，本文透过反思历代教会对流行疾病的回应，盼望能带给我们安慰。

作者：John D. Witvliet, Noel Snyder, María Cornou, Chan Gyu Jang

本文搜集的资料讲述了教会和流行疾病的故事，这些故事既让人绝望也充满盼望，既有折磨人的不堪痛苦也有鼓舞人心的牧养变革。这些是历史学家、编者和作家留给我们的礼物。我们很高兴能跟读者分享这些历史记录，也期待在未来能继续更新。

在按历史发展的时间线阅读时，请留心以下几个主题：

- 塑造教会来信靠这位充满爱的上帝
- 从诗篇获取必不可少的属灵亮光
- 基督肢体之间的团契和彼此扶持安慰
- 公祷和私祷，看重真诚的哀歌和发自内心的感恩
- 公共崇拜的重要性，透过公祷，讲道，诗歌，洗礼和圣餐，来回应危机时刻的特殊需要
- 教牧领袖共享经验，在圣灵的感动下教导和学习，建立基督的身体

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要操练去中心化（decentered）。基督信仰的智慧，历经许多个世纪，在不同的文化处境中，显出不同的宗派传统。从跟我们相差甚远的历史和文化处境中，我们能学习很多东西。这实在是基督徒谦卑美好品德的彰显。

我们要特别感谢回应者John Ross提出的观点：在文中列出的流行病中，当时的基督徒并未像我们一样能发现并明白疾病传播的原理。我们为科学发展感恩，让我们找到更合适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对彼此和上帝所爱之世界的爱意。

### 塞浦路斯瘟疫，主后250-270年

#### 迦太基主教 圣塞浦路斯（主后200-258年）

塞浦路斯疫情爆发于主后250年受难节期间，首先发生在埃塞俄比亚，第二年蔓延到罗马，最终到达希腊和希腊以东的叙利亚。这场瘟疫持续了近20年，峰值时期，罗马每日死亡人数高达五千人。造成这场瘟疫肆虐的原因是罗马帝国战争不断，主要由边境入侵引起的：日耳曼部落入侵高卢，帕提亚攻击美索不达米亚。干旱、洪水和饥荒让百姓民不聊生，帝国统治也因骚乱而政权不稳。迦太基主教圣塞浦路斯评论说，这就像世界末日……

这次灾难因他命名，因为后世主要从他的第一手观察记录了解这次瘟疫。在著作《关于死亡》（De Mortalitate）中，圣塞浦路斯详细记载了此次瘟疫那些可怕的细节。

—John Horgan, “塞浦路斯瘟疫，主后250-270年，” 古历史百科全书

### **塞浦路斯瘟疫，主后250-270年**

#### **亚历山大主教 狄俄尼索斯（死于主后265年）**

主后260年，在第二轮瘟疫大爆发期间，狄俄尼索斯写到：“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兄弟都展示出了无尽的爱和忠诚，不考虑自己只为他人着想……护理和医治别人。”在书信的后半段，他指出那些没能得到这种照顾的人情况是何等凄惨。他写到：“在刚发病的时候，（健康的人）遗弃病患迅速逃离他们最亲密的人……以防止这种致死瘟疫的转移和传播。”

—Stacy Cragi, “让我们传播互助而非瘟疫，” 阿什兰日报

### **黑死病，意大利，1348年**

#### **锡耶纳的凯瑟琳（1347-1380年）**

锡耶纳的凯瑟琳出生于1347年，根据作家小查尔斯·米(Charles L. Mee, Jr.) 的描述，“很有可能就在这一年，一种跳蚤跟随黑老鼠进入了意大利墨西拿港……这种跳蚤携带大量的芽孢杆菌鼠疫病毒。”老鼠、跳蚤和芽孢杆菌带来了有记录以来最可怕的瘟疫。从1348到1350短短的三年间，黑死病夺取了冰岛和印度近三分之一人口的生命。值得注意的是，年幼的凯瑟琳竟然存活下来。锡耶纳的凯瑟琳活了下来——并且积极帮助他人——在人类历史最具毁灭性的瘟疫中。

—“黑死病，” 今日基督教

### **黑死病，英国，1348年**

#### **诺维奇的朱利安（1342-1416年）**

诺维奇的朱利安生活在动荡年代，当时黑死病在欧洲肆虐。第一轮瘟疫爆发时，她才只有六岁。圣朱利安堂旁边的道路就是用来运送感染瘟疫而死的尸体，小朱利安一定听过运尸车经过的声音。英法百年战争在1337年爆发，同年两国教皇分裂，互相怀疑指责对方是敌基督。饥荒和牛病加速激发了农民起义，约翰·威克里夫和他的同伴——就是罗拉德派信徒，被宣告为异端。他们当中很多人被烧死埋在了朱利安教会的后面。朱利安一定知道当时的惨况。如此动荡的年代，朱利安领受了从神而来的意象，她把它们记录下来，作为上帝给基督徒的信息。

— “诺维奇的圣朱利安，” 新世界百科全书  
延伸阅读参考 Amy Laura Hall 所著的  
《嘲笑那恶者：透过诺维奇的朱利安看世界》

**黑死病，苏黎世，1519年**  
**胡尔德莱斯·慈运理（1484-1531年）**

1519年八月黑死病在苏黎世爆发的时候，慈运理正在温泉修养。尽管他当时因事工精疲力尽，但瘟疫爆发后，他马上赶回了苏黎世牧养感染者。很快他自己也被传染，病入膏肓。但他还有工作尚未完成，慈运理后来康复了。著名的疫中之歌，记录了当时他对上帝的信靠和后来病得痊愈的喜乐。

— “黑死病感动慈运理创作疫中之歌，” 今日基督教

**黑死病，威登堡，1527年**  
**马丁路德（1483-1546年）**

1527年八月瘟疫袭击了威登堡，众人因恐惧纷纷逃命。马丁路德和他已有身孕的妻子卡塔琳娜决定留在他们所爱的城市，照顾感染人群。尽管当时马丁路德的其他家人都要求他们逃离威登堡。但路德决定留下来救助那些感染者。他总结说，那些惜命逃走的人并没有错，只要有信心更强的人留下来照顾病患。

在这段充满未知和面临巨大挑战的日子里，路德给约翰·赫斯和在布雷斯劳的信徒写了一封题为《一个人是否应该逃离致死瘟疫》的信。

—Grayson Gilbert, 马丁路德和他在黑死病期间伟大作为， 神道（Patheos）

**1542年，日内瓦，黑死病**  
**约翰加尔文（1509-1564）**

在加尔文担当牧职期间，日内瓦曾经五次遭受瘟疫威胁。第一次疫情爆发是在1542年，加尔文个人蒙引领去探访一个感染瘟疫的家庭。明知此举可能意味着死刑判决，该城市的长老们为了阻止他这样做而施加干预，因为他们坚信加尔文的领袖角色是不可缺失的。牧者们在加尔文的领导下照旧继续着英勇无畏的服侍，他们述说着许多人归信的喜乐。许多牧者们因此而失去生命。而很多人并不了解，加尔文私下里在日内瓦和其他瘟疫肆虐的城市中继续着牧养关怀事工。

—格莱·柏雷，“在瘟疫时期事奉基督”，里高尼尔事工（Ligonier Ministries）

## 天花传染病，普林斯顿，新泽西，1758 约拿·单爱德华兹（1703-1758）

约拿单·爱德华兹，在初次担任新泽西学院（普林斯顿）校长期间，于1758年就《耶利米书》28:16讲了一场新年布道，题为（“今年你将死去”）。当时新泽西的普林斯顿正经历着一场天花传染病的侵袭。他后来注射了预防针，结果两个月后就去世。爱德华兹曾经有一次在他一场题为“光阴宝贵，爱惜为念”（1734）的讲道中说：“吾辈当极其珍视时间，因无法确知其能否延续。吾辈唯知时光短暂，却不察其究竟何短…”

—“当瘟疫临到：以往世纪的教牧关怀”，罗格学院出版社

## 霍乱，伦敦，1854 查尔斯·司布真（1834-1892）

作为一名年轻的乡村传道人，查尔斯·司布真仰慕那些在1665年伦敦大瘟疫（鼠疫）中留下来照顾病人和濒死之人的清教徒牧者们。在1854年秋季，这位在伦敦新公园大街教堂刚刚就职的牧师，在一场严重的霍乱疫情爆发之际，牧养着位于河对岸的宽街社区的会众。司布真如何就此做出回应呢？1）他以本地事工为优先。2）他调整了聚会，但坚持聚会。3）他关怀病人。4）他对新增的福音布道机会保持开放。5）他将生命全然交托上帝。

—一张乔福，“在霍乱爆发时向司布真学习的五个功课”，福音联盟。

## 1918-1919年大流感 北美基督教改革宗教会

在这场瘟疫流行中，本州下令禁止社交和宗教聚集活动，基督教改革宗教会杂志《旌旗》（Banner）呼吁读者们“迫切祷告使禁令尽快解除”以使教会重新开放。该刊还建议若干“从此神圣护理中所学功课”：当受限而失去自由聚集机会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教会领受的恩典”是何等宝贵：“与上帝百姓团契”，“圣徒相通”，这些或许能使教会对神的委身得以更新，并且比我们以往能更好地“欣赏宗教作品”，因为当人们不能来教堂聚会时，就会转向这些资源。

——1918-1919年大流感和“无聚会礼拜天”，加尔文大学 Heritage Hall

## 核战争威胁面前的群体瘧病 C. S. 路易斯（1893-1963）

1948年，路易斯…写了一篇题为“论生活在原子时代”的文章。在文中，他谈到他当时的大多数人针对核战争威胁的焦虑，…这是严肃而合理的担忧（在他所处的时代），路易斯写道：一方面，我们对核子炸弹想得过多。“我们要如何生活在一个核子时代？”我很

想回答：“何必如此？既然你曾经活过了16世纪伦敦几乎每年都免不掉的瘟疫，又既然你活过了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入侵者每天都可能夜间登陆突袭，并对你一剑封喉的维京时代；其实你正生活在一个癌症频发、梅毒蔓延的时代，一个发生空袭、铁路、汽车交通事故的时代，”换言之，我们不必夸大我们处境的新奇…这是首先需要指出的一点：首先需要采取的行动就是振作精神。如果我们都将被核弹摧毁，那就让我们在核弹袭来时，从事明智并人性的事务吧——祷告、工作、教育、读书、听音乐、给孩子洗澡、打网球、和朋友小酌聊天、玩飞镖——不要一想到核弹就像恐慌的羊群挤成一团。核弹能毁坏我们的身体，细菌也能做到这些，只是不要让它们统治我们的头脑。

—马可鲍尔，“新冠冠状病毒，气候变化和路易斯”

### 埃博拉，2015 塞拉利昂东正教会

在2015年埃博拉病毒在全球爆发之际，A. T. 阿达莫波罗正在塞拉利昂，和他的本国人民在一起，这里正是疫情爆发的中心。他在报告中写道：“从外国来的人不断给我打电话询问：‘牧师啊，你为什么不离开这里，救自己脱离潜在的感染源和死亡的威胁？’”答案很简单。上帝此时将我安置在西非，作为塞拉利昂羊群的牧者，和他们相守、照管他们、教导他们、安慰他们，引领他们、保护他们脱离无情夺人性命的恶疾，正是我的职责。此外，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教导基督徒牧者不可在危险临到时丢弃羊群。只有雇工会在遭遇危机时丢弃羊群（约翰福音10:12-13）。我们皆仰赖基督的保守。

—A. T. 阿达莫波罗，“塞拉利昂的埃博拉危机与东正教宣教”，东正教正统

原文链接：[Pandemics and Public Worship Throughout History](#)